

【基础教育理论】

“学校离村”的乡村教育新动向及其社会文化隐忧

——兼与“文字上移”提法商榷

周 晔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近十年来,乡村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应概括为“学校离村”,这是与“学校进村”相背而行的乡村教育新动向,这一动向的直接后果是大量乡村学校的急速消亡,进而很大程度上致使村落消亡和乡村社会瓦解加速、乡村文化“失地”、中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和乡村少年文化人格健全“土壤”缺失等问题,这些由“学校离村”带来的社会文化隐忧将是深远的。

关键词:“学校离村”;“文字上移”;乡村教育;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G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5)05-0118-05

DOI:10.13763/j.cnki.jhebnu.es.2015.05.02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对中国广大乡村的教育而言,最显著的动向莫过于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短短十余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村村有学校(小学)”的格局被改写,大量乡村的小规模学校因人为“撤并”和乡村少年及其家长对城镇及乡镇优质学校的追逐而消失。熊春文和万明钢等人认为,大量乡村学校急剧消失表明中国乡村教育正呈现出一个“文字上移”的新趋势^①。笔者认为,将这种现象和态势概括为“文字上移”,不甚准确,需商榷讨论。

关于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乡村受教育主体对乡村学校的“逃离”所导致的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所带来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到了:学生远距离走读存在潜在或现实的安全问题;年龄小的学生家庭关爱和亲情缺失导致的心理问题;学生寄宿学校或校外借宿增加家庭教育成本和负担问题;城镇中大规模中小学的管理不到位的问题,等等,并主要从这些层面对政府的布局调整政策及行动予以批判。可以发现,这些问题是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所带来的显性和表面的问题。那么,大量村庄

学校的急剧消失对乡村社会、中华文化以及乡村学生的发展有没有隐性的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呢?这是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

二、“学校离村”,而非“文字上移”

乡村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应概括为“学校离村”。那么“学校离村”与一些学者提出的“文字上移”有何不同?“文字上移”的提法有何不妥?

首先,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不是“文字下乡”走到极致的反过程。“文字上移”的提法是将其看成是与“文字下乡”相对的概念,熊春文认为,在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一种‘学在官府—文字下乡—文字上移’近乎完整的辩证法过程”^[1]。需要说明的是,“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民国期间,政府对广大乡村社区文盲现象严重的问题所采取的国家行动,其“抓手”是举办大量乡村学校(尤其是小学),历经百余年,文字借助于学校这一机构终于扎根于中国广大乡村社会。按照费孝通的观点,原先的中国乡村社会是没有也不需要文字的,所以文字借助于学校走进乡村社会

收稿日期:2015-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教育部青年课题“西北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结构失衡问题及破解政策体系研究”(GBA130159)

作者简介:周晔(1982—),男,甘肃靖远人,教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教育发展、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的过程被称为“文字下乡”。今天,文字已经在乡村社会扎根,而且绝大多数“乡村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文字,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的现象,并不能代表文字在乡村社会的消失,并不是当“文字下乡”过程走到极致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文字上移”的反过程。

其次,从社会现实来看,“文字上移”已不可能。今天的“学校”,对乡村社会来讲已不具有单一的“文字下乡”功能。今天的“学校”主要是一个代表国家教育权力的有型的实体机构。在乡村社区,能够代表国家权力和意志的机构有二:一是政府部门(乡镇政府及其下属的村委会),二是学校,有学者将村落中的学校称为村落中的“国家”,正是此意。而对于今天的乡村社区来说,“文字”已不具有代表国家权力和意志的符号意义,尽管其是主要载体,今天的文字也不是庙堂性的。历史上的广大乡村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不具备获取文字和外界信息的途径和能力;历史上的广大乡村社会,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乡(村)民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必要获取文字和外界信息。而今天的广大乡村地区,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加上原有的大量文盲者因年长离世而自然地减少,再加上社会的开放和乡(村)民大量流动,这能够充分证明今天的乡(村)民已具备获取文字和外界信息的能力;今天的乡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手机几乎普及,电脑网络发展迅猛,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社会了,乡村社区可以不只通过村落中的“国家”这一渠道获取文字和外界信息了。可以说,文字已经融入了今天的广大乡村,融入了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乡村学校的消失,并不代表乡村社区获取文字的渠道被撤销和关闭,乡村学校的消失并不代表乡村社区文字的消失。一句话,历史中的学校下乡进村代表着“文字下乡”,今天的乡村“学校离村”不代表“文字上移”。故此,近十年来村庄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用“文字上移”来概括不妥,而应该用“学校离村”来概括。

再次,“文字上移”不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文字下乡”曾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建国君民”之需的行动,是针对曾经广大乡村社会现实中的文盲特征和封闭社会生态的国家意志的反映。而近十余年,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地区撤点并校的国家行动,是政府在教育领域追求规模效益的价值取向和提升乡村学校教育质量的行动体现,不能代表国家“文字上移”意志。否则,这与中国各级政府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巨大成本才得以完成的“两基”工程的

目的相矛盾。所以说,乡村学校(尤其是小规模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只能是“学校离村”的事实动向,而非“文字上移”。

笔者所谓的“学校离村”中“学校”和“村”的关系是:“村”在,而原来在“村”的“学校”离开了“村”。在此,涉及一个应当成立的前提假设,即只要“村”在,只要有在“村”接受学校教育的需求在,“学校”就应该在“村”。本文的“学校离村”与“学校进村”是相对的概念。

三、由“学校进村”到“学校离村”:乡村教育动向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府发起了学校改造运动,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很多农村地方提出了“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1980年,国家提出,八十年代要在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而且要求以村级办学为主。从1985年首次提出加强基础教育、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政策,在我国形成“村村办小学,乡乡办初中”的格局,到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两基”,到2000年我国实现“两基”目标,再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在政府努力的过程中,广大乡村社会对学校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举办学校的热情和积极性也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半个世纪,政府下大力气,通过各种措施把学校嵌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落,解决了农民子女“有学上”的问题。

为了解决了农民子女“上好学”的问题,中国政府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原则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实施了农村中小学以大规模撤点并校为主的学校布局调整。一些地方,甚至曾经将撤并农村学校数量作为政绩,盲目地、“一刀切”地强行撤并,许多地方一个乡镇只保留一所中心校。十余年间,在政府宣称学校布局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大规模撤点并校直接导致了大量农村学校的急剧消失,农村的教育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

当然,造成学校离村的原因复杂,既与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农民及其子女的“离土”“离农”的趋向有关,也与社会大众对“好的教育”或“优质教育”的追求(对乡村,现实情况是,农民往往会想方设法地把孩子送到乡镇或城镇学校去)有关,而且往往

是这些因素的叠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其中,2006年到2010年的5年内,我国累计减少农村小学84158所、教学点22143个,合计106301所,平均每年减少26575所,每天减少约73所^[2]。

相较于十余年前的半个多世纪的政府把学校嵌入乡村社会的动向而言,近十年来乡村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无疑表现出“学校离村”的事实新动向。这是中国广大乡村地区教育的最大动向的转变。

四、“学校离村”的社会文化隐忧

“学校离村”引发了诸多新问题,已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但缺乏对“学校离村”后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的深层次研讨。今天,我们很有必要“跳出教育看学校”,我们将看到或已经看到,大量的“学校离村”很大程度上致使村落消亡和乡村社会瓦解加速,乡村文化“失地”,中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和乡村少年文化人格健全“土壤”缺失。这些影响将是深远的,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与警惕。

(一)村落消亡和乡村社会瓦解加速

嵌入并已扎根于村落中的学校作为村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村落的文化高地和村民未来希望的寄托之地,在短时间内突然撤走,对乡村社会系统而言,无异于将已构成肌体并已在肌体里面担当重要角色功能的器官突然抽离,必然带来肌体系统运行的紊乱,甚至是肌体的死亡。功能主义强调结构和文化对于整体的功能,从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理解,村落中的学校是整个村落社会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承担着相应的结构和文化功能。乡村学校大量急速消亡,势必直接导致或加速村落社会的系统功能紊乱,进而导致或加速村落的消亡和乡村社会的瓦解。冯骥才援引官方公布的数字说,在2000年时,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3]。李培林曾以“村落的终结”来形容这种现象。

固然,村落的消失或终结与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大量农民“离土”“离农”“离乡”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但我们注意到,其实很多地方村落消亡或终结

的诱因是乡村学校的消失。由于村落学校离开村落社区,尤其是在很多偏远山区,村民为了继续子女的学业,不得不无奈选择离开村落,离开土地,出现了“人随学移”的现象,一些地方“陪读大军”的出现也是“学校离村”的直接后果。“学校离村”与大规模进城务工潮联袂,促使很多地方村落消亡或空壳化,很多地方乡村毫无生机与活力,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很多地方乡村居民结构呈畸形状态(“386199部队”的说法即是明证),这些都是乡村社会被瓦解的现实表现^②。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离村”是导致村落消亡和乡村社会瓦解加速的原因之一。

(二)乡村文化“失地”

“学校离村”还致使乡村文化“失地”,这是“学校离村”导致的又一负面影响,而且是更深层次的。这可以从乡村学校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学校进村”的政府目的是使乡村学校传播正统的规训文化知识,而乡村学校一旦融入并扎根于乡村社会,其功能又不仅仅是传播正统的规训文化知识,其自然地承担起了更重要的传承乡村文化的功能,而后者对乡村社会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乡村社会主要是靠传统文化和乡村本土文化维持其基本秩序的(这一点先贤早有论述)。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和不断开放的大社会环境影响下,各种城市文化和外来文化对乡村社会不断渗透,乡村文化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很多相对有知识、有素养的“乡村能人”离开乡村社会寻求发展,直接导致乡村文化中坚力量主体的缺失,学校成为担当乡村社会文化功能的最后一片圣地。在乡村社会中,本来有两大“文化阵地”:传承民间的、生活本身的文化的戏台(尽管乡村的戏台活动经常和庙宇联袂,含有迷信色彩)和渗透政统的、抽象的、规训文化的学校。当下,前者在绝大多数乡村已被拆除或改为其他,而后者正在迅速消亡(10年前的乡村基本是“村村有小学”)。这些学校通常位于村落的中心位置,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也是乡村文化与公共生活的中心(尽管我们多年来批判乡村学校为乡村发展的服务功能微弱)。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高度分散的,而学校则是乡村最重要的具有“文化高地”地位的场所,对村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这个公共场所的吸引和感召下,村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并形成一定的公共观念。而且,现实中的乡村学校也经常成为村民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如科普宣传、“文化下乡”、技能培训、村民议事等公共活动往往选择在乡村学校。

学校对乡村社会而言是寄托希望与梦想的地方,是所在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适于居住性”的要素与象征。而且,对于我国许多较为封闭、偏远的山区村落,学校几乎是村落中蕴含文化气息韵味的唯一的灵动的标志性场所,是现代文明在村落的代表(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教学点)。尽管近年来在一些乡村建立起了“农家书屋”,但其对于乡村社会的文化功能远不及乡村学校(况且,不少“农家书屋”只是乡村的“花瓶”)。国外的一些研究也多次表明,学校的关闭或撤销,会使当地居民产生强烈的心理感受:认为是该地区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或一段时期的结束^[4]。

再从乡村教师的角度来讲,教师在村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们是当地的“识字人”“文化人”。他们对乡村社会的实际职责也不仅仅是教育学生、传授知识,还是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信息、文化沟通的纽带,还扮演着维系、调节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角色,他们往往在参与或主持乡村社会的各种仪式、礼节,参与调解邻里的矛盾纠纷等方面,成为乡村社会里的“场面人”“公理人”。“学校离村”使得乡村教师对乡土和乡村的告别和逃离更为彻底,即使是家在乡村的教师,也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乡村社会的“外来人”。

还有,借机于“学校进村”和长久的“学校在村”,在广大乡村社会形成的坚实的具象的尊师重教的乡村文化,将因“学校离村”导致的教师不在乡村之场,教育不在乡村之场,而慢慢削弱,虚幻,模糊,消散。

所以,“学校离村”后,对于被撤消学校的乡村来说,就是撤消了其文化阵地,乡村文化的传承将缺少阵地。

(三) 中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

“学校离村”可能带来的第三个社会文化影响是中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由“学校离村”带来的村落的消亡、乡村社会的瓦解和乡村文化“失地”的影响而衍生出来的影响。我们提到的“中华文化”,其构成要素中最主要的是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其最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和形式无疑是在中国广大乡村。一乡一风土,一村一世界。广大乡村有繁若星辰的乡土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天人合一的哲学伦理观、熟人人情的社会观,等等。广大乡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在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从乡村寻找精神食粮和灵魂慰藉。从社会样态角度来说,当今中华文化自然包括中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但

正如中国古建筑和文物学界泰斗罗哲文所言“中华文化的根基在村落,西安、洛阳和北京等大都市都是从村落发展起来的”^[5]。所以说,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乡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也在乡村。

历史是一面镜子。民国期间一系列著名的乡村教育运动,如:黄炎培的农村教育实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晏阳初平民教育实验,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之所以真正重视农村,真正重视农村教育,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判断:农村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根本。基于这样的判断,强调国家教育的重心在农村,强调乡村教育应以乡村生活为本位,以农村、农民为主体。先贤如此的判断,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当下乃至将来,都是需要我们所坚守的。但是乡村“学校离村”,导致乡村的空虚化和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和消失。

再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是文化的主体。“学校离村”,致使学校教育不再置身于乡土情境,致使乡村文化的重要主体——教师和儿童——不得不离开村落。与此同时,大批农村青壮年长期离村进城务工。乡村的教师、儿童、青壮年与乡村社会空间上的“在场性”和“稳定性”的关系特征的消失,使得他们处于“无根的抽象化空间”中,而留在乡村的年长者在乡村社会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久的将来也将故去。可以做出自然的推断,若干年后,真正的乡村文化的“人”也将大量消失。今天,我们也提新农村建设,我们也很不愿意去想象,将来,不具备乡村文化素养、不熟悉乡村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乡村人”——怎样、如何可能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

(四) 乡村少年文化人格健全“土壤”缺失

余秋雨认为,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个礼制的社会,维持社会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乡村的孩子们在乡村的时空中,天然地接受着乡土文化的浸染和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他们的人格在乡村文化的浸润滋养下自然天成。

乡村社会“学校离村”及村落的消亡将使乡村孩子的文化人格形成失去天然的土壤。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们,生活世界和初级群体对于人的认知和人格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学校离村”使得农村的学龄儿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脱离其具体的生活世界和初级群体,离开家庭和亲情,学生与乡土社会空间的接触与乡村生活体验不断被压缩,他们从头开始

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这势必导致他们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方面遇到困难。这种后果已经被已有的一些研究证明。

由于乡村文化是地方性的,那么乡村文化的传承就需要儿童“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学校离村”之后,乡村学生不得不离开村落,寄宿到城镇学校。而那里的学习和生活大多都与乡土社会无涉,学校教育与学生成长的乡村时空被剥离。也有研究表明,相较于非寄宿生,寄宿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易对日常事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6]。乡村少年文化人格的健全失去“土壤”,“乡村少年与乡土文化的亲近性缺失,使得乡村少年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少年”^[7]。我们注意到一些很让人痛心的现象,如远离家庭关照而寄宿于城镇学

校的一些农村学生,很快表现出与其学生角色(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角色)不符的“傲慢与偏见”——拉帮结派讲义气,消费跟潮流,忘记了父母血汗钱的来之不易;瞧不起身为农民的父母,鄙视生他养他的农村……

五、结语

“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一个老师,是一盏灯,那光虽是暗淡,却明明灭灭地闪了几千年,是烛照中国乡村的一线微芒,让人温暖且踏实。”^[8]

“学校离村”,将使乡村社会基因发生变异,将使乡村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将改变整个中华文化的生态系统,将使乡村少年的人格异化,这些足以让我们心忧!

注释:

- ① 见:熊春文.“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J].社会学研究,2009(5);熊春文.再论“文字上移”: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近期观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汪淳玉,潘璐.“文字上移”之后——基于三地农村小学寄宿生学习生活现状的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万明钢.文字上移:渐行渐远的乡村

教育[J].教育科学研究,2010(7).李强.中国村落学校的离土境遇与新路向[J].中国教育学刊,2010(4).

- ② 当然,对于一些偏远的小山村,因为“学校离村”到了大一点的乡镇或者县城,对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村民的眼界开阔有好处。但这不属于该文讨论的范畴。

参考文献:

- [1] 熊春文.“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J].社会学研究,2009(5).
- [2] 熊春文.再论“文字上移”: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近期观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 [3] 贺风玲,潘颖婷.自然村:10年消失90万[N].南方周末,2012-10-18, B11版.
- [4] Sara Heshkevitz, Socio-Spatial Aspects of Changes in Educational Service: TeAvive and Jerusalem, 1970-1988,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Apr 1991, 2.
- [5] 柳忠勤等.中华文化的根基在村落——罗哲文先生小记[J].今日国土,2009(11).
- [6] 张眉,翟晋玉.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大家谈[J].中小学管理,2009(6).
- [7] 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J].书屋,2006(10).
- [8] 李泓冰.盲目撤并乡村学校浇灭农村希望灯火 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2_05/25/14808414_0.shtml.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ural schools

ZHOU Ye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Recent decade or more has seen rapid disappearance of rural schools, the consequence of which i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schools are gone for good. This is a prelude to collapses of rural social life, and loss of rural culture. These effects are far-reaching and irreversible, and so it should be given a special attention and vigilance.

Key words: school leaving village; text moving up; rural education; community; culture

[责任编辑 姜惠莉]